

文学文本中“海外”的局限性

——从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谈起

李 霏

作为晚清重要的政论家、改革家,王韬在学界受到相当的重视,但是这些研究的视角主要以王韬这两个身份入手,而忽略了他作为文人的角色。而对其文人角色的探讨,在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样的个案分析为我们梳理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王韬,近代文学史中已多有论述,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陈则光《近代文学史》和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三部文学史中,除任本主要论述王韬的时文,另外两部都将重点放在了小说上,而且都指出王韬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海外的描写^{〔1〕}。本文将王韬涉及海外内容的小说统称为海外题材小说。经典的文学史论述中,王韬海外题材小说的贡献在于拓宽了小说表现的内容,重在旧文学中的“新”字。而我认为,不在于内容的新,而在于新题材中的旧。新题材与旧话语之间的关系,王韬的转换方式、写作心态以及这背后的原因,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新旧是近代文学上的老题目了,而且有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限制,但是,在王韬这里,新旧仍然是谈论他最方便最有效的切入点。

—

王韬海外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淞隐漫录》

中,分别是《记日本女子阿传事》、《海外美人》、《媚黎小传》、《海底奇境》、《海外壮游》、《桥北十七名花谱》、《泰西诸戏剧类记》、《柳桥艳迹记》、《东瀛才女》。另一部小说集《淞滨琐话》中也有一些海外题材,如《东瀛艳谱》(上下),但其描写范围没有超过《淞隐漫录》,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以《淞隐漫录》的小说为主。本文对海外题材小说的界定从宽,但实际上海外是有层次的。海外风光当然是海外,但海外之所以称为海外,不仅要有风光,还要有精神,两者的结合才是海外的真正体现。具体到小说中来,就是不仅要有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更要有突破传统框架的异质思想、个性,套用王德威教授的话说,就是要有“摆脱中土本位架构”^{〔2〕}的可能。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可以对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分类。《桥北十七名花谱》、《泰西诸戏剧类记》、《柳桥艳迹记》、《东瀛才女》在今天的意义上,不能算作小说,更适合归为笔记、游记。当然,在王韬那里,笔记、小说本就是不分的。按理说,东洋西洋都是海外,但实际上有差别的。三篇关于日本艺妓的小传,虽贴着日本的标签,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中国的,与《东部雏伶》《三十六鸳鸯谱》(上中下)这样给中国妓女作小传的小说没有实质差别,严格地说并不能算真正的海外题材。剩下的五篇中,《海外美人》里的海外更像一个虚拟的海外,尽管里面也提到了意大利这样的具体国名,但整个故事和外国关系不大,海外美人的神

奇,不是西洋的科学技术,不过是传统神怪小说的幻想的变形。《海底奇境》与《海外壮游》里的海外确实是真正的海外,还是传统的传奇故事。《海底奇境》的故事重点在聂瑞图与瑞士女子兰娜在海底的邂逅,海底不是对现实西洋景象进行艺术加工幻化出的海底,而是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景象。真正的海外内容在这之前就结束了。《海外壮游》的内容和题目倒很相符,确实到西洋壮游了一番。不过壮游是为了顿悟,只是顿悟的过程——即对繁华世界的体验——放在了西洋世界。这当然说明王韬对西洋的肯定,也确实是一种扩大艺术范围的尝试。

整部《淞隐漫录》中,真正对框架有所突破的海外题材小说,只有《记日本女子阿传事》和《媚黎小传》。《记日本女子阿传事》里的阿传生性浪荡,与邻人浪之助偷成伉俪私奔,后丈夫死去,阿传回乡并再次私奔。最后为生计所迫流落风尘,因为吉藏不给钱并且怀疑他是前夫之死的凶手,遂将其杀害,自己也被正法。阿传是个矛盾的女人,生性放浪、自主的意识、环境的逼迫在她身上纠缠在一起。她与邻人浪之助偷成伉俪以及市太郎作文君之奔虽是浪荡的表现,可同时也体现了轻视常规的自主意识。⁽³⁾如果切除故事里个人道德品性的成分,阿传的故事倒是新文学里“娜拉出走”故事的一种预演(当然其内含比娜拉出走要简单得多)。如果再忽略性别,阿传故事中体现的独立自主的个性与艰辛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五四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题。这样的层层剥离小说原有要素的方法,不是为了把王韬的小说与新文学搭上关系,称之为前驱,而是为了说明这个文本本身蕴藏的丰富性。但是这样的丰富性在王韬这里全都被压抑住了。这篇小说不是王韬的创作,而是转述,故事的原本是日本的一出戏剧。⁽⁴⁾但是王韬将其转述为小说至少说明他对这部戏的认可态度。转述过后的文本依然是一个传奇、讽喻故事,尽管文本体现出对阿传的个性的欣赏、不幸的同情,但主人公自身的矛盾和她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并没有细致地展示出来。

另一篇写女子的《媚黎小传》情节更为曲折,是一个跨国三角恋爱故事。媚黎为了摆脱在英国的爱情纠纷来到中国,却仍然躲不开旧情人的纠缠,最终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将旧情人杀死,同时自己也被旧情人杀害。小说中女性追求爱情的自我意识以及表现爱情的激烈方式都是五四新文学的话语资源。然而,媚黎这样一个新女性却被王韬进行了中

国化的改造。这个中国模式的开启,正是在媚黎登山去往中国邮船的那一刻。媚黎“甫登舟,见一华人自英旋华,容貌魁玮,衣冠煊赫”,而男“本惊女妖冶,思通款曲,遂以船主为介,与女执手为礼”。一开头就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初见倾心的场面。后来二人私定终身,恩爱悠游。但这样的改写似乎还不够,媚黎不但要成为温婉可人的娇妻,而且还要成为辅佐男人建功立业的贤内助。夫妻俩虽然建了功,但“卒不能见用于时,落寞而归”,又过上了悠然自得的名士生活。这更是典型的中国话语。直到约翰来华,媚黎才摆脱这个模式,体现出独立女性独立自主、勇敢决绝的个性来。“此人以计杀我婿,几陷我与死地,智狡而狠,岂复有些子情意哉?今日之来,殆为我也,我今已得所归,岂复甘从汝散人!俟其来,当以一言绝之,设或不然,愿拼一命,以殉彼,借以报我婿之愁仇,庶可见我婿与九幽之下。”⁽⁵⁾王韬对媚黎中国化的改写,一是符合中国士大夫的想象,二是增加了故事的传奇色彩,使小说趋于一个中国式的传奇,而小说中真正的新因素——女性的自主意识就在这样的改写中被打折了。《淞隐漫录》中共121篇小说,可是真正有打破传统架构可能的海外题材也就两篇,它们显示了其他几篇海外题材不具备的异质性因素,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中土本位架构,被同化了。但是这样的同化或者说改造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异质性因素与传统发生冲突的体现,只是不那么明显。

二

比起游记,王韬小说中的那些海外内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部游记中,《漫游随录》的信息量大得多,尤其是第二部分对英法的考察。“巴黎胜概”、“法京古迹”、“博物大院”、“保罗圣堂”、“风俗类志”、“制度述略”、“制造惊奇”,既有概述,也有具体记录,不仅涉及文物古迹博物制造等物质层面,还涉及风俗制度等社会文化层面,不只是猎奇,更是有目的的考察。不过比起稍后出国公使如郭嵩焘、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王韬的考察也不深入。王韬思想性的东西都在时文这样一种文体中表现出来,代表就是《弢园文录外编》,因此《漫游随录》不用承载这么多的经世致用功能。“海外”进入游记看不到小说中的改造,这得益于游记这种文体的特点,它比较自由,一方面可做载道之用,另一面也可发言志之意。《漫

游随录》确实给游记带来了新气象,但没有文学的刻画,所以《漫游随录》中的海外没那么强的文学异质气息。而作为文学末流的小说,作为致用的海外不需要进入,而作为精神上异质的海外又很难进入,结果存在于其中最多的,就只是海外风光这样的猎奇了。《漫游随录》这样的游记可能和王韬的时文一样,是王韬作品中最有新气象的。

《扶桑游记》与《漫游随录》差别颇大。这部游记更像中国传统的游记,主要是交友游玩,对日本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记录甚少,和日本人笔谈也一笔带过,这样状况的出现可能出于王韬的私心,即对日本的警惕,不愿意过多把经验传授给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王韬此时的文化优越感。出游西洋,王韬虽然具有平等的心态,而游览日本则不然。首先,他是被日本人邀请去请教西方经验的,潜在里有一重老师的身份。其次,那时候王韬依然认为日本的文化受中国影响,在文化上中国是日本的老师。还有一层原因就是王韬的锐气已经不像游历西洋时那么旺盛了。1879年王韬去日本已经是天命之年,1870回港至此时已经九年,九年来王韬作为边缘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改革,但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日本之行,倒成了排遣失忆的好方法,因此整部《扶桑游记》有一种放浪形骸之感。对应落寞才子、醇酒美人就必不可少了,查其游记,半数以上的天数都有对艺妓的记载,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小说中王韬如此钟情于给日本妓女立传。在《扶桑游记》里,真正的海外已经少了很多,精神上 and 小说更为接近,海外在这里又变成了猎奇和寄托。

三

两部游记差异的原因,可以从《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的序言中探求。在《淞隐漫录》自序中,王韬说“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尾弱冠,弃而弗为”。⁽⁶⁾崇实黜虚,情理之中,弃而弗为就有问题了。真是主动弃之吗?这里面有为谋生计的打算。在序中,王韬批评“近人惟怪之欲闻”,“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可是《淞隐漫录》本身正是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这样的矛盾不过是无奈愤恨之举,“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写小说的目的是

“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王韬说自己“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则过激了点。这里是用一种较为激烈的情感方式表达自己的抑郁不得志。而在《淞滨琐话》的序言中,语调明显轻松,小说“不过驱使烟墨,供我谈谐而已”⁽⁷⁾,意思就是游戏之言。王韬的两篇序文,看似矛盾,内里却有相通之处,用五四的话语来概括正合适:“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⁸⁾。用世之志不能实现,在游记中表现为醇酒美人,在小说中就是才子佳人、奇情异事。

对序言的分析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五四新文学具备的要素在王韬那里没有释放出来。王韬有海外游历经历,提倡改革,具有求新求变的自觉意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其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外来因素,这些条件看起来可以让他在文学上做出一些创新,可是为何这些可能性都没有成为现实?作为一个晚清的先进知识分子,王韬并没有摆脱传统文人的身份。⁽⁹⁾王韬还停留在传统中,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想象与趣味,对阿传故事的转述可见王韬的趣味就在于欣赏故事的新传奇性。而媚黎故事不仅有趣味,还有想象,将其塑造成一个有理想的中国美人,有那么一点个性,但又完全被笼罩在男权的标准之下,达到了一种传统范围内的最佳中和。在实际和想象层面,王韬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这也正是他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他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在王韬那里,重要的是“文”而不是“文学”。“文”是经世致用的,如他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上的时论政论,而游记和小说不承担这样的功能。当五四新文学家说“把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者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们批评的不是晚清的功利主义,而是鸳鸯蝴蝶派们以及王韬这样的旧式文人。不过,王韬这样的文学观不一定是个坏事,如果他受到文学界革命影响,我们看到的海外题材的小说很可能成为新中国未来记,也就是《弢园文录外编》和小说《漫游随录》和《淞隐漫录》)里海外题材小说的结合体,是一个四不像。当然,同时,五四新文学对王韬的批评也十分有道理。那就是王韬对待小说的非严肃态度。如果有严肃的态度,他本可以对《记日本女子阿传事》或者《媚黎小传》作更深刻的改写,而不是传统传奇式的改写。这里引发出第三个问题,即王韬的文学修养。不能说王韬的文学修养不够,以传统文人的标准,王韬倒是诗文俱佳。在《漫游随录》里,王

韬考察的文化层面包括制度、风俗、教育,但是没有文学。王韬毕竟游历西洋两年,相比于国内文人有很好的条件学习西方文学,本有机会利用外国文学资源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造,做出更有价值的突破实践。

也不能陷入这样的误区,即王韬学习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就可以写出类似新文学作家的先驱式的小说。对于王韬忽视西方文学思想资源,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王韬本人不会外语,不能直接进行阅读。二是王韬接触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传教士,他们的兴趣也不在文学上,在这方面与王韬交流不多。以上是客观的限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王韬的自信。在中西交流不对等的情况下,王韬的自信显得尤为可贵。但不能否认,文化上的自信遮蔽了一些东西。在大道同的基础上,文学这样的末流以及相关的文艺思潮、哲学思想王韬并不是很关心。至少从王韬的著作中,这些没有对王韬形成多大的刺激。这里以最早在近代中国杂志连载的翻译小说《听夕闲谈》为例。韩南教授在他关于这部小说的论文里提到了很多同化的翻译现象,这里不再赘述。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魂为主,使人之碍于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与恬适之境者也。”⁽¹⁰⁾这句话文艺色彩很浓,形而上的意味较强,但到了后文则转向功利的一面。可见在当时,较为纯粹并严肃的文艺观并没有成形。但在这里,小说的位置至少被提高了,而在王韬那里,小说还在末流处徘徊。晚清对西洋的学习,大致经过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王韬大致处于制度——思想层面的过程中。他关心制度,也关心思想,但是当时思想文化上的输入还没形成规模,而王韬作为一个西洋的输入者,对文化层面的东西关心还不多。王韬有机会走得更超前一些,但是历史条件加上自身的问题,限制了他在文艺上走得更远。

结语

上面的论述很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中,当我们仅仅把王韬的局限于历史的虚线并等同起来,那么王韬的个案分析的意义就不大了。还是回到王韬的小说。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旧瓶如何装新酒。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有新名词新内容,甚至有了新思想,但当他们被放进小说

中,我们看到的还是笔记小说、传奇故事,新酒放进旧瓶,只是不那么旧的旧酒而已。以《记日本女子阿传事》和《媚黎小传》而言,它们的旧不在于使用的是文言,而是传统文言小说背后那种传奇故事的模式,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中土本位架构”的文化心理机制。这样的机制不打破,阿传只是个传奇中的女子,而媚黎早晚会变成理想的中国妇人,那些海外题材的小说也就不可能变成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作品。

王韬的例子也凸显出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意于梁启超的努力。同时,还不能忽略晚清民初大规模的文化输入。先驱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溯源是要有度的,仅仅以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去确定源头很容易使工作本身变得苍白。自主意识当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如果忽略了这种自主意识的具体语境,那么追溯可以上推到魏晋甚至先秦。只有结合了具体的历史与文本的语境,那些现代性的因素才是有意义的。王韬的个案提示我们,在晚清复杂的中西交流状况中,重要的是那些新文学的因素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新文学的,而不是这些孤立的因素本身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现的。

注释:

(1)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原话是“海外风光和世俗民情的描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8页。郭是把海外风光和世俗民情放在一起论述的,而海外因素也局限于风光。本文着重论述的是王韬小说中的海外因素,不仅仅是风光。

(2)王德威在影响广泛的论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将中国文学中表现的现代性概括为自主求新求变脱离中土本位架构的意识。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本文并不是说王韬的小说已经脱离了中土本位架构,只是指出其海外题材的小说显露出这样一种可能。

(3)可以确定阿传身上还有真爱情,比如和浪之助的结合,她为浪之助治病。而与吉藏则没有,她与吉藏是利益交换关系,否则她也不会杀死吉藏。

(4)《扶桑游记》中对这出戏剧有记载,其故事情节和小说没有丝毫偏差,差别仅在于细节。而且小说中的细节很可能是原剧的细节,只是在游记中被省略了而已。

(5)(6)王韬:《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自序第2页。

(7)王韬《淞滨琐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页。

(8)《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9)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而文人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指对传统文学有浓厚兴趣并有较高修养的人。

(10)《瀛环琐记》第3卷,上海图书馆藏,《听夕闲谈》从此卷开始连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